



徐晋

萧乾先生曾感叹:一部“北新书局”出版史,几乎就是中国现代“半部文学史”。鲁迅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、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《风雨谈》《雨天的书》、冰心的《春水》、郁达夫的《迷羊》《日记九种》《达夫短篇小说集》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名著初版本,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。“北新”即“北京大学新潮社”简称。1925年3月在翠花胡同正式成立,1926年6月又成立上海分局。分局的成立为北新书局南迁打下了基础。

北新书局的创办者是李志云、李小峰兄弟俩,李志云后来做别的生意去了,李小峰一直是实际主持人,担任常务董事兼经理。北新书局早期同人还有孙伏园等。北新书局成立后,因为赢得了胡适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支持,尤其是鲁迅先生屡屡把自己的书稿交给北新出版,使得北新在当时的出版界大放异彩,沪上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后来曾称之为新文学出版的“老大哥”。

从1929年2月起,陈伯吹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担任了长达十年的教师职业。这所学校的校长陈济成对陈伯吹十分信任,也很看重他的才华,把一门比较新的课程《地理》的教学任务交给了他。这个时候的陈伯吹,每天真是够忙碌的。上午他要去给幼师的学生们上课;下午又要作为学生,到大夏大学不同教室里去听课;到了晚上,除了要给幼师的课程备课,心里还时刻惦记着要给《儿童世界》等刊物写稿子。除了创作儿童文学,他还为当时很有名的刊物《北新》半月刊、《小说月报》等写过一些给成年人读的诗歌和小说。

1929年,他从这些诗歌中选择了12首,编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《誓言》,交给他的第一位正在经营着一家名叫“芳草书店”的朋友黄中给出版了。这本诗集在1930年问世后,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,有位读者还专门写了一篇书评,其中说到:“最近我读了陈伯吹君的诗《誓言》,觉得他的诗在每一行字之间,流露着真、美、力的表白,给予我的是其他诗集中找不到的新的印象。”

的确,这些表达了一个青年青涩而委婉的心曲的诗歌,多少也带着这个时候的陈伯吹朦胧的初恋的情绪,带着一些“少年维特式”的忧郁和烦恼。当然,他最看重的,并且获得了郑振铎等名家赞赏的,是他的儿童诗。《誓言》出版之后,他又把在《儿童世界》和《小朋友》上发表的儿童诗编选了一下,选取了42首小诗,按照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季节的顺序,编成了一本儿童诗集,取名《小朋友诗歌》,送到了北新书局。

在北新书局当编辑的赵景深先生,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,曾经翻译过安徒生童话,而且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儿童文学。赵景深看到了陈伯吹送来的《小朋友诗歌》,颇为欣喜,认为这些小诗童心灿烂,语言活泼,而且念起来朗朗上口,就决定马上出版。同时,赵景深还高兴地向他的老板、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建议说:“陈君的《小朋友诗歌》写得相当有

趣,我有个想法,不如就在这个集子的基础上,编辑一套《小朋友丛书》,借以弥补今日儿童读物稀缺的困境。”李小峰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出版商,也是一位慧眼识珠的出版家,他同意了赵景深的建议,并且很愿意约陈伯吹来书局谈一谈。

1930年3月里的一天,陈伯吹应邀来到了北新书局。这几乎也是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时刻。交谈的结果是:不仅他的《小朋友诗歌》马上可以出版问世,而且他还欣喜地接受了李小峰、赵景深委托给他的一项不小的创作任务:为小孩子撰写20来本儿童读物,组成一套《小朋友丛书》,全部由北新书局出版。

这个计划,对于正处在半工半读状态的青年陈伯吹来说,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,当然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本来,李小峰的胃口是100册的规模,但是一向做事谨慎的陈伯吹,只敢答应接受20册的编写任务。

这年6月,《小朋友诗歌》如期出版。没有想到,书甫问世,就受到了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关注。陈鹤琴热情地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《小学生读的诗》,刊登在他主编的《儿童教育》杂志上。文章里写道:

在英文小学教育杂志上,我常常看到许多给小学生阅读的诗歌。这种诗歌,很可以启发小学生的思想,陶冶小学生的情绪,而且很可以促进小学生的文学兴趣,增加小学生的文学知识。因此,我就想汇集许多诗歌送给小学六年级学生阅读,欣赏欣赏。不过,在中国诗中,适合儿童心理与教育原理、可为小学生背诵的,实在不多。兹从几本诗集中选了15首、3首歌谣,以便小学生在10月份欣赏与背诵。

陈鹤琴为小学生们选的儿童诗,其中有刘大白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康白情这样的名家名作,也有像陈伯吹这样的新人新作。15首儿童诗中,刘大白的最多,有5首,陈伯吹占了3首。

《小朋友诗歌》问世之后,陈伯吹开始集中精力为北新书局撰写《小朋友丛书》其他各册。从他领受任务的4月份起,到当年年底12月份,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,他陆续编写完成了《小朋友故事》(上下册)、《小朋友戏剧》(上下册)、《小朋友会话》、《小朋友童话》(上中下册)、《小朋友小说》、《小朋友的朋友》,还有《小朋友寓言》(上下册)、《小朋友通信》、《小朋友卫生》等10本书。

这些书大多是他一人撰写的,少数的一两本是他约别的作者执笔的。其中儿童文学占大多数,像《小朋友卫生》之类的,虽然不是儿童文学,但是用文学笔调写的儿童知识读物。这些读物,是陈伯吹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,奉献给孩子的第一批沉甸甸的果实。

陈伯吹很幸运地遇上了赵景深这样热心的好编辑。赵景深对陈伯吹可以称得上有“知遇之恩”。当赵景深陆续接到陈伯吹完成的一本本书稿时,他一边审稿,一边用欣赏的口吻对老板李小峰说:“清浅有味,不枝不蔓,陈君真是天生的儿童读物作家啊!”

陈伯吹的稿子每一页都是那么工整、清爽,小小的毛笔字看上去像是女孩子写的圆秀小楷。他



新中国成立之初,陈伯吹在写作中

的这种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,一直保持到了老年。拿着这样清爽的稿子,赵景深在审稿时工作效率特别高,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,有时一本书从审稿、排版到校对、出书,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需要。

有一天,赵景深又突发奇想:目前很多稍大一点的出版社和书局都为小读者创办了儿童刊物,例如中华书局有《小朋友》,商务印书馆有《儿童世界》,北新书局也算是大出版社了,为什么不给小读者多办两份刊物呢?

他把这个想法跟李小峰一说,李小峰想了想,说道:“主意是好主意,可是关键是我们得有几个得力的编辑。给小读者编刊物,首先应该喜欢小孩子,最好还能自己亲自动手写写画画……”

赵景深说:“我倒也有个想法。”李小峰一听,眼睛发亮,“哦,愿闻其详,请赵君不妨讲来听听。”赵景深说:“我听说,陈伯吹君还有两个月就从大夏大学毕业了,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?”

李小峰真不愧是一位干脆、果断的出版商,他双手一拍:“那就拜托赵先生找陈君谈谈,可以先请他着手筹备出书事宜,一毕业就可来北新上班。”

这个决定真让陈伯吹喜出望外。因为这段时间他确实已经在考虑毕业后的职业问题了。能到北新书局为小读者编杂志,这对他来说,简直就是“瞌睡来了,有人递来了枕头”一样。

他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极其严谨和细致的人。他兴奋地带到李小峰的办公室,轻声问了一句:“李先生,我要不要辞去在幼师的那份教书的兼职?”

李小峰笑着说:“我看不必了!你来北新,可以一半时间编杂志,一半时间仍旧教你的书,给你月薪60元,不知陈君意下如何?”在这之前,陈伯吹在老家朱家宅小学当老师时,月薪是10元,每年实际拿到手的只有10个月的月薪;在宝山县一小时,虽然身为初级部主任,月薪也只有区区14元。而现在只要付出一半的时间为书局工作,月薪却有60元!这样优厚的待遇,还有什么可说的呢!

这一瞬间,陈伯吹的眼睛都湿润了。他站起身,深深地给李小峰鞠了一躬,说:“李先生,感谢您和陈先生的知遇之恩!您这样宽宏大量,让我照顾两边的工作,我只有心存感激,努力为书局效犬马之力了!”

李小峰摆摆手说:“陈君言重

了。陈君乃一代俊才,肯来北新屈就共事,也是北新的荣幸!我建议你回去收拾一下,最好近日就来就职吧!”

果然,第二天,陈伯吹就到北新书局报到就职了。当然,他同时还在幼师兼任地理老师,也在大夏大学继续听课。

他为北新书局创办的儿童刊物,取名《小学生》半月刊。本来,李小峰、赵景深都力邀陈伯吹担任这份杂志的“主编者”,但是陈伯吹觉得自己人微言轻,声誉不够,就再三推辞。最后商量的结果是,《小学生》“主编者”由陈伯吹、赵景深、李小峰、林兰四人共同署名。林兰是李小峰的夫人,也是一位儿童读物作者,《小朋友丛书》里的《小朋友山歌》《小朋友谜语》,就是她编写的。

仅仅经过一个月的筹备,1931年元月,《小学生》半月刊正式问世。当时,《小学生》聘请的特约撰稿人中,既有陈伯吹过去在宝山一小时的几位爱好文学写作的老同事,如周向之、陈荷百、徐学文等;也有李小峰、赵景深联系的儿童读物作者,包括沈百英、徐调孚、张锡昌、徐亚倩、顾均正……总之,凡是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一些能写点儿童文学、儿童科普和知识读物的作者,都聚拢到了《小学生》周围。

《小学生》问世不久,陈伯吹就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顺利毕业了。因为他终于获得了大学

的学历,他兼职的幼师也把他的月薪增加到了60元。

这一年,陈伯吹24岁。他的工作收入,终于可以让他比较充裕一点去孝敬自己的母亲了。至此,不公的命运总算给这个心地善良、勤奋上进的年轻人,送来了些许温暖的阳光。

1932年,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。幸有英勇的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奋起抵抗,日本侵略者遭到了沉重打击,不得不暂时停战,与国民政府谈判,最后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,上海的战事暂告结束,社会秩序逐渐得到了恢复,书刊出版业也算是重新起死回生。

这时候,陈伯吹比以前更加忙碌了。为了帮助寡母养活一大家人口,他除了继续在北新书局主编《小学生》杂志,在外面的兼职也有所增加。在幼师的课程之外,大夏大学又开办了暑期讲习班,也邀请陈伯吹去讲授儿童文学课;远在浦东高桥镇上的新陆师范学校,也邀请陈伯吹每周去上一次儿童文学课。

这些兼职,除了让他更加劳累,倒也没有影响到《小学生》的编辑出版,相反《小学生》在读者中的口碑和市场的销路越来越大了。这时候,《小学生》的良好影响,引起了上海滩上另一位出版人的关注。他就是儿童书局的经理张一渠(笔名徐晋)。

早在1932年8月以前,张一渠就在筹备创办一份《儿童杂志》,分高、中、低三个年龄段出版三个版本。他也看中了陈伯吹又能写、又能编的才干,很想把陈伯吹“挖”到自己身边去。但是,陈伯吹是一个讲究朋友道义的人,北新书局的李小峰、赵景深对他有知遇之恩,他没有答应张一渠的延请。

张一渠只好退而求其次,把陈伯吹的名字列在《儿童杂志》的“特约撰稿者”名单中。这份特约作者名单里,另有陶行知、吴研因、陈鹤琴、沈百英等赫赫有名的儿童教育家和儿童读物作家。由此可见张一渠对陈伯吹的推重。当陈伯吹的长篇童话《波罗乔少爷》写完后,张一渠好说歹说,硬是从陈伯吹手上把稿子拿走,放在《儿童杂志》高年级版上开始了连载。

当时,上海出版界各家的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。儿童书局对陈伯吹频频“示好”,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不可能看不见。随着陈伯吹在儿童读物创作界和出版界的名气越来越大,不少出版社都来找他约稿。陈伯吹又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,只要自己能做到的,也就不好意思说“不”。就在这期间,陈伯吹又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了一套初级的《小学语文课本》,并配套编选了8册《小学语文默读课文》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次在北新书局之外的撰稿和出版举动,李小峰对陈伯吹产生了不满,觉得陈伯吹已经对北新有了“二心”,不可久留了。不久,北新书局就借故解聘了陈伯吹在北新书局的合约。

陈伯吹也是一个十分敏感、自尊心很强的青年,虽然心里还有些依依不舍,但是为了双方的情面,还是友好地离开了北新书局。临别那天,李小峰还特意摆了一桌酒席,感谢陈伯吹为北新书局做出的贡献。此时,《小学生》半月刊已经出版了71期,每一期刊物里浸透了陈伯吹的心血和汗水,包含着他的心心念念。

1934年春天,张一渠的儿童书局聘请陈伯吹担任了编辑部主任,陈伯吹在编辑出版领域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天地。

新书

《汉宝德的人文行脚》
汉宝德 著
2017年3月出版 29.00元



这是20世纪后半引领台湾现代建筑思潮的重要学者汉宝德先后发表在《大地》《探索》《当代设计》的专栏选集。他在推动台湾建筑教育、文化遗产保存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,在生活中对人文现象相当关注。书中内容分为建筑、文化与环境。在建筑上,作者主张现代主义的理性加上乡土主义的感性;在文化上,他是创新的支持者,但在内心里却以历史与传统为重;对于环境,作者主张开发应遵循生态的原则。阅读这本书可以和汉宝德一起进入他的人文世界。

《引臂连类:文学研究的关键词》
郑毓瑜 著
2017年1月出版 45.00元



本书将“引臂连类”这一由《诗经》发端的诗学传统上升到譬喻理论的高度,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法,更是中国传统认知世界、通过“越界”和“跨类”的方式在类分事物的基础上连结“物/我”、“情/景”、“身/心”、“言/意”的一套生活知识、理解框架和价值体系,由此形成迥异于西方以逻辑推演为主要认知方式的“中国‘关联式’、整体性的宇宙观、世界观和思维方式。作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,广涉经典的文学研究、思想史、人文地理学,并借鉴人类学、艺术史和新文化史对“物质”的研究。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关于罗洪先生的处女作

金传胜

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,罗洪先生曾撰《我的第一篇作品和第一本书——一个重要的补正》,认为自己的首篇作品是随笔《在无聊的时候》,发表于1930年5月16日《真美善》第6卷第1号。此后,学界一般都将该文视为罗洪的处女作,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开端。不过,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,罗洪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期间,就已有作品发表于校刊上。在1926年7月出版的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》第19期上,便刊载了一篇署名“姚自珍”(前

注:“前师三年级生”)的文章。虽然这是一篇文言短文,但因早于《在无聊的时候》,就目前而言,可算是罗洪先生的处女作了。原文为句读形式,现代为标点,照录如下:

各述家庭之状况

我家在松城之西。余呱呱堕地,祖父母及父母均爱之甚。越年而祖母见背。斯时,余茫然无涯的开端。不过,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,罗洪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期间,就已有作品发表于校刊上。在1926年7月出版的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》第19期上,便刊载了一篇署名“姚自珍”(前

前遍种各花。每于三五之夜,辄集家人坐庭中,相对谈笑。我母缓缓述我儿时状况,我等或唱歌,或讲故事,以娱亲心,其乐融融。余年十四,负笈来苏。今每忆往事,就在目前。余当力求上进,以副【负】二亲之期望。愿与弟妹共勉之。

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》系半年刊,编辑者是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。前身为1915年11月创刊的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汇刊》。由于《各述家庭之状况》一文叙述了罗洪的家庭状况与成长历程,对于研究罗洪的童年经历无疑颇有裨

益。该文虽然比较稚嫩,却显示了罗洪的文言文素养,同时也将其公开发表作品的的时间前推了4年。

另外,许多文献在介绍罗洪先生时,说她1923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,或说她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。两种说法可能缘于罗洪本人在《怀念吴健雄》一文中曾言“我们从苏州毕业是1929年”。不过,这样的表述其实是不太准确的。这就不得不提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历史沿革。该校创办于1912年7月,首任校长为杨达权,校址位于苏州盘门内新桥巷。1927年,因江苏省实行大学区制,改名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,内设师范

部。1932年至1949年,改称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(抗战期间停办)。1949年9月,与江苏省立苏州师范学校合并,定名新苏师范学校。新苏师范学校后又称苏州教育学院,现已并入苏州市职业大学。因此,罗洪入学时校名应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,毕业时则已名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。如果都谓为苏州女子师范学校,显然是与史实不大相符的。

著名学者郑树森教授在《读罗洪小说札记》(1980)一文中曾说:“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中国作家里,罗洪大概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。”三十多年过去了,情况还是大体如此。2006年,上海

文汇出版社推出了3卷本的《罗洪文集》。2010年,艾以、沈辉、卫竹兰等编纂的《罗洪研究资料》,作为“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”的一种,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印行。这些图书的出版本意在于推动罗洪作品的保存、传播与研究。然而实际情形似乎不太乐观,研究界对罗洪的兴趣十分寡淡。通过查阅学术期刊数据库,便不难发现近年来研究罗洪的论文屈指可数。笔者勾勒罗洪先生的处女作,既是表达对于这位刚刚离世的,以数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为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前辈的悼念之情,也希望学界能进一步深化对其作品的研究。